

试论印尼语国语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唐 慧

内容提要 印尼语是作为“团结民族的语言”而诞生的,它既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民族内聚力的形成。印尼语的国语地位能得到确立和巩固,有效地防止和解决了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内部对民族统一语言和民族身份的分歧;对密切印尼各岛屿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印尼语 马来语 语言政策

在历史上,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往往和争取民族语言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征服、同化异民族的过程也常常伴随语言的强迫同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挣脱了殖民统治枷锁的国家都把本国一个主要民族的语言确定为国家官方语言,如印度的印地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等。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尽管经过种种努力,但今天这些国家作为国语的民族语言仍未取得超越其原宗主国语言英语的地位。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很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用本民族的语言去取代法语或西班牙语的地位。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印尼虽然曾遭受过荷兰殖民者三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但是荷兰语在印尼的影响却相对较小。倒是印尼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其国语地位日益牢固不可动摇。本文试图从印尼语的前身马来语的语言发展和特点、荷兰殖民语言政策的影响、印尼语是印尼民族凝聚力的纽带等问题出发,对印尼语国语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马来语的发展及其语言特点

如果和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语言相比,印尼语是相当年轻的。“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是19世纪末开始才出现的,而正式有“印尼语”这个说法只是上世纪初的事情。印尼语和马来语有亲缘关系、印尼语是在马来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一个少数族群的语言而不是印尼最大族群爪哇族的语言,具备成为这个国家国语的基础?为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马来语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历史上,马来语是通行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廖内群岛、邦加岛、勿里洞岛及马来半岛的一种语言。自古以来,马来人就以善于航海和经商著称,在印尼群岛的很多港口都有马来人活动的足迹。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开始算起,马来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马来语、中期马来语、马来“混合语”三个阶段。

古马来语是指7世纪起至13世纪末的马来语。唐朝高僧义净曾于671年、686年、689年三次羁旅室利佛逝,研究和翻译佛经,并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多次提到“昆仑语”。学者们推断,义净在室利佛逝国求法时所学的昆仑语可能就是古马来语。此外,考古学家在苏门答腊巨港、邦加和占卑一带发现了四块7世纪的碑铭,这四块碑铭都是用印度的跋

罗婆字母刻写的,夹杂不少梵语借词。经考证,上面的文字就是古马来语。¹

中期马来语是指14世纪至19世纪的马来语,特别是指马六甲王国鼎盛时期的马来语。如果说古马来语中还有不少梵语借词的话,那么中期马来语则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语借词,而且马来语一度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这种现象与当时大批阿拉伯人、波斯商人纷至沓来,伊斯兰教传入印尼有关。正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商业活动的扩展,中期马来语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印尼各岛屿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际语。尤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六甲王朝的鼎盛时期,马来语广泛传播。

马来“混合语”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混合语”是指在语言频繁接触的地区,不同语言集团的人用来作为共同交际工具的一种语言。从7世纪到19世纪,马来语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先后吸收了梵语、阿拉伯语、荷兰语、英语和汉语等大量的外来语言成分,此外,还吸收了不少印尼其他方言和地方民族语。经过10多个世纪的演变,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岛际和跨族商业活动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形成,马来语进入一个特别的发展阶段,成为印尼各民族间进行商业活动和沟通交流所广泛使用的一种混合语。这种语言虽不甚规范,但在当时它是一种容易理解、并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的一种语言,其传播范围很广泛。到20世纪初,马来“混合语”在成为市场用语、各宗教的传教用语、学校的课堂用语、新闻媒体的用语、近代文学的用语和行政机构的用语之后,实际上已经担负起全国各族间的交际用语的职能。和以前各阶段相比,马来“混合语”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却是印尼语诞生前的重要阶段。

从马来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了解,马来语在印尼能发展成为印尼语,客观上是由于马来人分布广泛,马来人善于航海、经商,这些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马来语的传播,使它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各通商口岸的交际语。此外,从语言本身的特点来看,和印尼最大族群的语言爪哇语相比较,马来语具有如下一些优势:第一,马来语没有爪哇语中纷繁复杂的等级之分,易于学习和推广。在爪哇人看来,不同等级之间用语的选择和言谈的方式总是有差别的,在交谈的双方之间不显示出社会或家庭方面的地位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非马来人学马来语较容易,而非爪哇人学爪哇语却十分困难。此外,印尼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和带有封建“礼节”色彩的爪哇语相比,马来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语言。第二,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其语法结构比较简单易学,词汇没有复杂的形态变化,运用方便,便于在老百姓中流传。第三,马来语能迅速适应社会的发展,向所有与它接触的语言开放,不仅吸收大量的外来词汇充实自己,同时还吸收很多方言词汇为其所用。第四,尽管马来语的词汇总量相对来说比较贫乏,但它的构词手段丰富,词缀灵活多变,能大量派生新词以补充词汇的不足。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在20世纪初的时候马来“混合语”才被选定为印尼全民族统一的共同语,并最终发展成为印尼的国语。

二、荷兰殖民语言政策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之前,世界上并无“印尼”这一地理概念,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一直使用“荷属东印度”来指称现在的印尼。16世纪末,荷兰人尾随葡萄牙人来到东印度群岛,在他们到达之初就发现马来语已成为东印度群岛各族之间的交际语。荷兰海员林斯荷登在他的《荷属东印度航海记》一书中写道,马来语不仅闻名遐迩,而且在东方各国语言中被敬为首位,在东印度不懂马来语,就如同在荷兰不懂法语,²可见当时马来语的地位和作用。一开始,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群岛曾用强迫

¹。孔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34页。

手段通过葡萄牙语宣传罗马天主教,荷兰人出于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目的,改用广泛传播的马来语来宣传基督教,把它作为教会学校的课堂用语,而基督教的圣经《新约》和《旧约》分别于1731年和1733年被译成马来语出版,对推广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殖民者的这一举措无意中也有效地扩大了马来语的影响。但由于那时的荷兰殖民政府除了传教之外不重视对当地人的教育,因此还未考虑过在殖民地采取何种语言政策的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殖民统治的扩张以及西方人企业的迅猛发展,政府和企业对低级职员、雇员的需求增加,对当地人的教育才应运而生。在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政策问题上,荷兰殖民官员和一些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在东印度大力推广荷兰语,抵制马来语。他们认为如果东印度有一百万知识分子掌握荷兰语,那么就能确保荷兰对东印度的长期统治。即使将来东印度独立了,荷兰的文化思想仍将长期保持影响,荷兰的商品仍将在东印度畅销。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向东印度当地人教授荷兰语,他们的理由主要包括如下几点:(1)马来语多少已具备了大众交际语的职能,甚至在米纳哈沙等地更迫切需要发展当地土著的方言(以满足传教之需);(2)如果荷兰语在广泛的范围内推广,难免会产生克里奥尔化,¹变为一种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东印度—荷兰语”,这将有辱荷兰语之纯正;(3)当地土著居民将会因为掌握了荷兰语而变得傲慢,从而给殖民政权带来麻烦和困难;(4)荷兰语很难学,尤其对东方人而言更是如此;(5)荷兰语是提高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重要工具,当地人一旦学会了荷兰语,就能掌握欧洲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就会产生觉悟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尽管这些人对推广马来语也有不满,因为马来语总是与“伊斯兰教”相联系,然而,当时的马来语确实实已成为了一种传播广泛的“混合通用语”,因此,他们得出一种结论:强迫荷属东印度的所有人去学一种新的而且很难学的交际语无疑是一件很愚蠢的事。²

这两种意见虽然相互对立,但都是从维护殖民统治的利益出发的。经过6年的讨论之后,到1864年荷兰殖民政府明确地排除了把荷兰语作为普遍教学用语和土著学校教学课程的想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让当地土著中的上层人物和社会精英掌握荷兰语的重要性。因此,最终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一方面,把荷兰语确定为第一官方语言,开设供贵族和富家子弟就读的学校,通过用荷兰语作为教学用语传授西方文化,培养一个亲西方的知识阶层,为殖民政权服务;另一方面,用地方民族语作为教学用语来教育当地土著居民,如果地方语不可行,可选用马来语。从1865年开始,针对土著居民的基础教育可选用5种不同的教学用语,其中包括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马都拉语和巴达克语;从1877年到1900年,教学用语扩大到13种;到1928年,发展到24种;1940年更是达到了30种之多。”与此相适应,荷兰殖民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从事东印度地方民族语的研究,编出了一系列地方民族语的语法书、词典、教材之类的读物。在所有的殖民国家中,像荷兰如此这般“重视”殖民地地方民族语发展的,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了。无疑,荷兰殖民者这种既不积极传播荷兰语,也不任由当地人推广马来语,而是极力发展各地方民族语的语言政策,其用意就是通过突出某一地方民族语,煽动地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民族隔阂和矛盾,阻挠统一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诞生和发展,其实质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政策的一种表现。

这一语言政策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到19世纪末期,懂荷兰语的东印度当地居民不超过5000人,他们大多是居住和工作在大城市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政府官员或从事西化教育的教师等。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道义政策”的推行,殖民政府为培养更多的合作精英而采取了一些教育改革措施,如开办中、高等学校和各种培训学校以及工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等高等专科学校,用荷

¹ K rood isasj 意指混合语母语化发展变化过程。

² » Kees G roen eboer “Politik Bahasa Pada Masa Hindia Belanda”, *Waana*, vol 1, no 1, April 1999 pp 35-36 34.

兰语进行教学,使受教育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总的来看,荷兰殖民当局提供给东印度当地人的教育还是相当有限的。到1928年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选择了马来“混合语”作为全民族统一的共同语时,当地居民中荷兰语的识字率才只有0.32%。这同其他殖民地人口的外语水平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在菲律宾,20世纪30年代末已有1/4以上的居民会说英语。¹为此,有很多荷兰人质疑殖民当局是否对荷兰的语言和文化在殖民地的移植予以了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撰文写道:“正是由于荷兰人自己,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才选择了马来语作为对抗荷兰影响的武器。”²还有学者认为:“与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同的是,荷兰殖民者在传播他们的母语时,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显示身份和威望的语言教授给当地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名流,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实用的交际语和潜在的世界语来推广。”³

尽管如此,马来语成为东印度各民族统一共同语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荷兰殖民当局取消他们限制荷兰语教育的政策。相反,因为担心土著中出现受到民族主义者影响的“白领无产阶级”,更是加强了对荷兰语教育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和马来语相比,荷兰语对土著民族主义的产生更具危险性。事实的确如此,选择马来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民族主义者们大多数用荷兰语交流和思考,对他们而言,荷兰语不仅仅是获得西方知识的途径,更是使他们有可能远离自己的“传统”社会而从外部来审视它,并对殖民地社会做出尖锐评价的渠道;同时还是与国际上的反帝国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渠道。此外,也正是荷兰语让他们有可能去憧憬一个后殖民社会,并对民族的未来做出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荷兰语创造了选择马来语成为印尼全民族共同语言的条件。无疑,殖民政府的教育目的是要培植亲荷势力和合作精英,但客观上却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造就了一批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成为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先锋和中坚。

三、印尼语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

20世纪初,印尼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成为时代的需要。1922年在荷兰留学的荷属东印度学生成立了“印尼协会”,将他们的国家正式称为印尼,并提出了争取印尼独立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作为团结全国各族进行战斗的工具和武器。一开始印尼最早觉悟的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宣传时有的用马来语,有的用荷兰语,有的用爪哇语,还处于一种不太自觉的状态,但后来他们在革命运动中逐步意识到,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个民族的形成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只有在具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民族的内聚力。

在当时的印尼,荷兰语是殖民主义者的语言,能掌握荷兰语的只是少数受过西化教育的人,普通老百姓大都听不懂,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对它很反感,用它来做宣传民族独立运动的工具缺乏群众基础。而爪哇语虽是印尼最大族群的语言,但它有纷繁复杂的等级之分,非爪哇族人学爪哇语有一定困难。况且,用一个大族群的语言来做宣传工具难免会带有大民族主义的色彩。马来语虽是一个小部族的语言,但它简单易学、运用方便,在老百姓中流传广泛,已被许多部族接受,甚至在雅加达、三宝壟、泗水、日惹等大城市已经广为流行。所以,选择马来语作为斗争的工具,无疑能收到很好的成效。

¹ M.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 1300 to the Present*,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 152.

² » Kees G. Moenboer, “Politik Bahasa Kolonial di Asia: Bahasa Belanda, Portugis, Spanyol, Inggris dan Perancis”, *Wacana*, vol. 1, no. 2, October 1999, p. 205.

随着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人民觉悟的提高,要求把马来语作为印尼人民共同语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对印尼人民表面上做出一些让步,于1918年成立了所谓的“人民议会”。一开始,荷兰政府禁止在人民议会中使用马来语,人民议员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通过斗争,人民议会被迫答应了广大人民的要求,除荷兰语外,马来语也是议会的正式用语。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是促使印尼语诞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觉悟了的印尼人民已经作为政治要求正式提出把马来语作为统一的民族语言了。

如果说以前印尼人民喜爱马来语,以此与荷兰语对抗,还处在一种自发的不自觉状态,那么这以后印尼人民对马来语的热爱和促进活动则完全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许多民族主义者和进步团体、政党都主动用马来语进行宣传。在1920年发表的耶明的十四行诗《印度尼西亚,我的祖国》就是用马来语写就的。耶明指出:“在商品经济和政治领域,马来语已经占据首要地位。我本人确信,马来语迟早将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统一语言。而未来的印度尼西亚文化将由这个语言来体现。”¹果然,几年之后的1928年10月28日,第二届印尼青年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青年誓言”,正式把马来语(确切地说是马来“混合语”)确定为印尼全民族的共同语,即印尼语。

此后,印尼语在印尼的使用远远超出了商业交际语的范围,进入了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一些知名的记者、作家用印尼语进行写作,政治家们用印尼语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印尼语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民族独立斗争不可或缺的强大武器,在客观上团结了印尼各族人民,密切了印尼各岛屿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推动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进一步增强了统一的民族意识。1938年6月印尼语言学家们在梭罗召开了第一届印尼语言大会,会议对印尼语的发展做出了几项具体决议,提出要求修改荷兰人制定的拼音法,为印尼语编写语法书,等等。然而在当时没有获得独立的情况下,要真正把印尼语发展成为印尼民族自己的语言是不容易的。

1942年日军占领了印尼,并规定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禁止使用荷兰语,因为荷兰语被视作“敌方语言”。他们原打算在印尼普及日语,但这毕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达到的目的。鉴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动员印尼人民参与“大东亚圣战”,急需使用印尼各族、各阶层人民都熟悉的共同语,这时只有印尼语才符合这一条件,它成了不论官方还是非官方都使用的交际语。

其实,日本占领当局的真正意图是,暂时先用印尼语来全面代替荷兰语,等其统治地位巩固后,再强行推广日语,把印尼永远当作它的殖民地。基于这种战略思想,日本侵略者编出了一套骗人的假话,说什么“立即给印尼人民以独立”,将大力普及印尼语算作是让印尼人民独立自主的一项措施。由于当时的印尼语词汇有限,要用于法律、公告、官方函件、各种书报杂志,特别是科技、经济、文化领域,难免出现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况,这就迫使印尼语吸收大量西方语言、印尼地方民族语和雅加达方言中的词汇,一时出现了词汇上的混乱现象。对此,日本人在1942年10月成立了“印尼语委员会”,负责审定印尼语中的现代术语、常用词汇,编写规范的印尼语语法。²日本占领军的真实目的是充分利用印尼语来巩固自身的侵略统治,但客观上却对普及印尼语起了推动作用。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在1945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统一的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1950年公布的《临时宪法》又规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官方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从1928年青年代表大会以决议的形式确定马来“混合语”为印尼统一的语言,到以宪法形式确定其国语地位,其间只经历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印尼语如此迅速的发展和它地位

¹ 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

² 孔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第55页。

明显的变化,在当代世界史上还是少见的。与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比起来,印尼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宪法上把印尼语确定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与载体,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家园。它体现了这个民族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与成果,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见解,同时又是团体认同的符号,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相关。所有这些在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中凝聚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成为一种民族亲和力、凝聚力。¹ 因此,在确立了印尼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之后,印尼语就成了维系印尼全民族的纽带,也是印尼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而如何推广和普及它,则成了当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为此,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首先是组织人力修改印尼语的拼音规则,先后经历了5次拼音方案的改革,最终于1972年制定了现行的印尼语拼写法。除修改拼音规则外,印尼政府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统一的国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印尼语,使用规范的印尼语;另一方面,考虑到语言推广的渐进性,政府规定在学生未能掌握好印尼语的地区或通讯不便的边远地区,小学的头三年可以使用当地语言作为过渡性教学语言,除此以外,从小学到大学的唯一教学语言是印尼语,地方民族语则作为选修课程。在书籍出版方面,除外语教科书外,几乎所有书籍都用印尼语出版,广播和电视里播放的节目也以印尼语为主。1991年印尼政府还专门建立了印尼教育电视台,播放以印尼语为教学语言的讲课录像,还邀请语言学专家在电视台举办语言专题讲座。通过上述这些渠道的大力推广,印尼语的普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印尼政府还组织了一些机构,专门从事维护和发展印尼语的工作。尤其是1975年由“国家语言所”改建的“语言建设和发展中心”,更是专门负责研究印尼语和地方民族语及其文字,以及编写它们的词典和术语等。1954年的第二届语言大会后,印尼又分别于1978、1983和1988年召开了语言大会。尤其是第五届大会规模空前,除700多位印尼学者外,还有十多个外国代表团,苏哈托总统出席了开幕式。会议再次强调:在民族建设的范围内,坚持将印尼语作为维护民族团结的语言。并提出“印尼语是稳定地开展建设和民族防御的工具;运用印尼语的能力是谋求公正、平等的福利生活的途径”。这些观念无疑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印尼语的国语地位。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世界上因语言文字差异而造成国家分裂隐患的事例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因坚持使用法语,要和使用英语的加拿大其他地区划清界限,独立建国,而且内部还要分裂成法裔区和英裔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众多语言文字使美国保守主义人士也有很深的“魁北克忧虑”,以至于频频采取措施强化对新移民的英语同化。而早在1948年,杜勒斯就说过这样的话:“摧毁苏联,不需要原子弹,只需要暗示其各民族说,他们没有俄语照样能行。于是经济的、文化的和其它各种联系就会遭到破坏。苏联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² 可见,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还在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毋庸置疑,印尼政府对印尼语的推广和普及所采取的各种渐进和强制性措施就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要求。通过重视印尼语作为教育、政府和商业用语的发展和传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民素质和工作效率,激发印尼人热爱印尼语和运用印尼语的自豪感,使印尼语的国语地位日益稳定和牢固,进而强化和巩固印尼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在,对于许多印尼人而言,印尼语已代表了进步和现代化。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印尼这样一个有着17508个岛屿、300多种部族语言的国家,政府在考虑

¹ 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7页。

² 萧净宇、李亚龙:《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俄语安全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88页。

大力发展全民族共同语言的必要性之时,并没有忽视发展各地方民族语言的重要性。1945年宪法就有这样的规定:语言的差异,通过保留有差别的省区语言来实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印尼历届政府在推广和普及标准印尼语的同时,都没有禁止地方民族语或方言的意图或想法,在印尼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当然,印尼政府更明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承认所有语言的平等性及其自由发展的必要性并不一定会导致国语地位的动摇,但削弱国语的地位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民族和国家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尽管普及印尼语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但印尼政府的目标还是很明确,已将普及计划安排到了2041年。¹

四、结 语

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完全受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它的产生往往有人为因素,是人为干预语言发展的结果。在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如果全民族共同语言的普及程度很高,那么就表明这个社会或这个国家的高度统一性。因此,为了使一个民族或国家达到高度统一,在语言使用上,推广和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很重要的。作为印尼民族共同语的印尼语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作为“团结民族的语言”(bahasa pemersatu bangsa)这一职能,它既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同时它的诞生又促进了民族内聚力的形成,有效地防止和解决了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内部在民族统一、语言、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和冲突,对推动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印尼语的国语地位确立后,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广和普及它,始终要求全民使用规范的印尼语,使这一语言的国语地位日益牢固不可动摇。与此同时,政府并不禁止地方民族语的使用和发展,而是采取尊重和支持的态度,这种语言政策得到了各族群民众的广泛认可和肯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尼国内的语言环境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印尼政府通过印尼语来达到语言上的团结并最终实现全民族团结统一的政策将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Abstract As the language which unifies the whole nation, Bahasa Indonesia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hes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Bahasa Indonesia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not only prevent and settle the disputes over national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 multi-national and multi-language country,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relations and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s between islands and nations.

(唐慧, 副教授, 洛阳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 洛阳, 471003)

[责任编辑: 罗 葳]

¹ 张光军主编:《亚洲人文百科论丛(语言·文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